

# 「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新拓展

## 議事論事 常樂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也於隨後發布，這些政策的出台，不僅標誌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實施日益走向縱深、成果日益凸顯，更表明粵港澳三地合作日益暢順、「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不斷發揮，粵港澳三地合作新的體制機制正在形成。

中共十九大以來，「一國兩制」被確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方略，也被實踐證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項顯著治理優勢。因此，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不僅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基本制度，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制度，還是新發展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制度。

從「一國兩制」的性質、地位與作用看，其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安排是長期性的，也是戰略性的。從這一角度看，「一國兩制」不僅能夠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發展階段的「特色」，甚至還可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中）的一個本質性規定。從回歸以來，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實施以來看，一方面，中央一直高度重視和肯定「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另一方面，「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也一直在中央的支持下不斷得到豐富、完善與拓展。

### 發揮港澳賦權賦能

這裏談三個方面的觀察：

一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具有「梯度演進」的發展趨勢。「一國兩制」從其創立起，除保障港澳和平回歸祖國的制度——功能優勢外，還有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和推進國家改革開放及現代化建設的制度——功能設計（與優勢）。回歸後，「一國兩制」在港澳順利實施，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功。隨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家戰略，就是在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充分認識和利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基礎上，所作出的「有利

於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涵」的安排。之後，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規劃、設計與實踐，也都是堅持「一國兩制」方針，豐富「一國兩制」新實踐的戰略性安排。這就明顯使「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具有了港澳特區——粵港澳大灣區——粵港、粵澳（深度）合作區等的梯度演進功能拓展趨勢，尤其在深圳先行示範區及大灣區先行先試、示範帶動的制度建設目標下，「一國兩制」的制度也就有了進一步擴展的可能。

二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發揮要對港澳賦權賦能，充分保障其高度自治。「一國兩制」方針政策，首先在港澳地區行使，其目的就是在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範圍內，充分發揮港澳的資本主義制度和高度國際化的優勢。在世界日益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成為國際交往基本規則的今天，港澳的「一國兩制」無疑具備與國際接軌的先天優勢。加之，港澳地區人口眾多、土地面積狹小、資源有限，嚴重限制其制度優勢的發揮，因此，回歸以來，中

央一直支持港澳拓展其制度治理的地理邊界。深圳灣口岸、橫琴口岸、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及深圳河南岸的河套地區等屬於一類，通過中央授權在不改變土地性質歸屬的前提下，由港澳特區直接按照特區制度管理；而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深圳河套科技創新合作區及前海深港服務業合作區則屬於另一類，通過中央授權和地方政府間的合作探索，建立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在後者的實踐方面，無疑粵澳橫琴合作走在了前面。

### 探索三地合作新體制

三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發揮要以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行使為前提。粵澳、粵港合作區的治理及「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發揮，充分尊重和保障港澳的治理能力十分重要，但是也必須在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行使這一前提，在大灣區及新型合作區等豐富「一國兩制」新實踐的這些區域，探索和推進中央全面管治權與港澳高度自治權的有機完美結合十分迫切和重要。

這其中，首先是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行使，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先行示範區、新型合作區等的規劃制定、頒布及配套性制度的設計和發布，以及對地方政府單項或清單式優惠政策的授權。

其次還可以建立自上而下的區域合作領導架構及相關人員安排。大灣區建設，中央建立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吸收粵港澳三地政府行政首長參與；而相關合作區開發管理機構，則由粵澳或粵港共建共管，提高行政層級，屬地管理與多元管理並行。

最後還要明確，在內地相關區域雖然採用港澳的相關制度，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但是仍要「集中精力抓好黨的建設、國家安全、刑事司法、社會治安等工作」。其實，這對於「一國兩制」的港澳實踐也應有所借鑒。

註：本文是202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治理體系創新研究」（批准號：20&ZD158）階段性研究成果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 轉變治理理念 推動香港大發展

### 慧言真語



王惠貞

在中央的主導下，香港社會開啟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市民和社會各界對提高特區管治效能、實現香港良政善治有了更高的期待。迫切需要打造一支愛國忠誠、擔當作為、管治能力強、社會認受度高，以及善於破解香港深層次問題的特區政府管治團隊。

中央一直對香港厚愛有加，多次強調「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對香港賦予重託。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40多年的進程中，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國家主席習近平高度評價說：「香港同胞一直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此，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從未忘記。」他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港澳同胞和社會各界人士發揮的主要作用，包括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雙向開放的橋樑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和城市管理的借鑒作用。改革開放，港澳同胞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

世易時移，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世界在變、國家在變，香港在變但也沒有變。香港之變化，在於社會局面的改變，有了國安法，香港終於迎來社會穩定；香港之變化，在於選舉制度得到完善，社會終於不再撕裂折騰，放下「泛政治化」紛爭，開始聚焦經濟民生，開始對教育、傳媒等領域長期存在的問題進行糾偏校正。可惜，香港也有該變而未變之處：傳統經濟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治理模式一成不變墨守成規；治理思路缺乏長遠規劃、「國之大者」意識有待提高，等等。

回望國家，幾十年來發展日新月異，令世人驚嘆。中國制度、中國模式一枝獨秀。香港承「一國」之優，行「兩制」之便，在「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的同時，亦應樹立「學國家所長，補香港所需」的意識。比如，國家一切為了人民的理念、舉國辦大事的動員能力、善於着眼未來謀劃長遠的前瞻力、敢於與時俱進自我革新的勇氣魄力，等等。都值得特區

治理學習借鑒。

我們的國家以人民所需所盼為出發點落腳點，全心全意打造人民美好生活；我們的國家善於擘劃長遠，五年一規劃，一張藍圖幹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幹；我們的國家敢於自我加壓、自我革新，不斷給自已出答卷、寫答卷，以「趕考」永遠在路上的真誠努力，致力於民族復興、人民幸福。

正因為有這樣的執政黨，我們的國家積累了舉國辦大事的動員力。比如去年武漢遭遇突如其來的疫情，前往支援的醫護人員達3.2萬人，其中解放軍醫護人員就有4000多名。萬眾一心，經歷76天的封城，終於取得戰略性勝利。人們說「全世界最好的武漢，被全世界最好的人守護了」。

再比如面對貧困這一人類社會的頑疾、古今中外治國安邦的大事，我們國家自2012年以來，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組織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脫貧攻堅人民戰爭。8年累計選派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幹部，同近200萬名鄉鎮幹部和數百萬村幹部一道奮戰在扶貧一線，披荊斬棘、櫛風沐雨，其中1800多名幹部獻出了生命。終於達至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創造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類似這樣的事例很多。

大時代大變局中，香港的治理理念是否也應有所轉變？體現市民的所思所盼、解市民之所憂所慮？比如改變按部就班的節奏和模式，以市民住房醫療等民生問題作為攻堅專項，千方百計加以解決；比如面對「修例風波」、疫情等突發事件時，動員一切可動員的人力物力，有所統籌，有所配合，有所分工，集中力量處理；再比如，官員如何培養大局觀、大眼界？在落實「十四五」規劃時，也要學習並思考香港如何進行中長遠規劃，如何培育新的發展增長點？

改變政府治理觀念模式，學習國家所長，補香港之短——既是市民所盼，更是香港發展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所需。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 清除區議會「政治瘀血」 盡快重回正軌

### 議論風生

#### 林偉文

特區政府昨日安排首批區議員進行宣誓。區議員作為公職人員，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若果缺席宣誓儀式，即代表自動放棄議席，必須退還其議員薪津。筆者對於特區政府的果斷做法十分認同，認為除去議會內的「政治瘀血」，盡快讓地區管理工作重回正軌。

事實而言，地方管理出現「怠政」的困局，始於黑暴時組成的區議會。很多所謂的「政治素人」憑着喊得兩句「攞炒」口號取到區議會席位，他們根本連議會運作及功能都不知道。相反，他們只是逢政府必反，不論利民紓困，還是方便居民的，都要帶頭反對。行動目標非常清晰，就是拖垮政府的施政。這班「政治素人」進入區議會的目的，就是為日後的奪取特區管治權而鋪路。

香港政治制度的重大改變，始於十多年前的政制改革，提高了區議會的地位，令區議會由地區諮詢的民生角色，變成為實踐參政的角色，將整個諮詢架構變得政治化。區議員有機會投票選出特首，他們的地位突然提升，攞炒派於是藉機肆無忌憚將政治議題帶入區議會。其中最為筆者氣憤的是，前年黑暴發生後，時任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琼在會議上譴責警方執法，抹黑警方「濫用暴力」云云。區議會是根據基本法設立的非政權性區域組織，試問，攞炒派的行為是否已超出區議會的職能，是不是濫用職權？及後，多個區議會有樣學樣，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再者，現屆區議會就職後，各區的攞炒派議員即時叫停所有上屆區議會通過的地區工程，包括：興建行人天橋、升降機、休憩地方等，興建中的工程亦要擱置。這些社區設施都是便利當區居

民，為何他們以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來剝削居民的福利？

中央認真攞炒派的政治動機，作出即時行動，通過完善選舉制度，削減了區議員參政的機會，立法會內的「超級區議會」議席取消；區議員亦被取消出任選委會委員。中央的做法，無疑截斷了攞炒派實踐「攞炒十部曲」的妄想。同時，警方國安處亦拘捕多名觸犯香港國安法的區議員。特區更按法例要求，安排區議員進行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

事實上，大批攞炒派區議員不願宣誓而辭職，導致多個區議會議員數目大幅減少，或會影響議會運作，影響特區政府的地區施政。然而，這亦給予政府一個機會，思考如何改革區議會的定位、功能，如何有效改變地區的施政，由「地區管理」改變為「地區治理」。

中山大學公共行政管理學碩士

## 利用大灣區優勢 發展新興產業「現代中藥」



#### 廖美香

全球在為治療新冠病毒確診者而殫精竭慮，中醫科學家張伯禮院士去年3月於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上分享中國利用「三藥三方」治療新冠肺炎等抗疫經驗，引起了世界對中醫藥的關注。筆者於月前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時，來自英國的大學醫學院教授談及醫學科研時，期待深入認識中醫藥在治療疾病上的貢獻，從而增進人類的健康福祉。可以預料，中藥現代化正是中西方及各國醫護界的期盼，也是中國新興產業發展的一個亮點。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現代中藥是內地培育壯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而要塑造健康灣區，中央支持香港發揮中藥檢測中心優勢，與內地科研機構共同建立國際認可的中醫

藥產品質量標準，推進中醫藥標準化、國際化。

由於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口，市場有限，本港一些藥商寄望未來可到河套進行科研，以便進軍大灣區開發市場，並輻射到全國。事實上，本港不乏有志之士為中醫藥現代化及國際化賣力前行，但礙於港深生物科技合作生態尚未形成，無論生產規範、臨床試驗及藥物上市等多方面都遭遇重重困難。

團結香港基金於七月發表《策動灣區港深引擎孕育生物科技新機》報告指出，在河套區大力發展生物科技，除了致力完善藥物發現、臨床前研究、臨床試驗和生產及上市的一條龍設施，還要推動突破共性關鍵核心技術。基金會建議中央政府提供政策，加強統籌一區兩園協調發展，爭取中央綜合授權，落實生物科技改革試點政策。此外，兩地體制機制必須銜接，包括協調兩地知識產

權制度，加快河套區藥品審評審批，以確保河套有效發展生物科技。

推動中藥現代化及國際化，香港可發揮重大使命。在科研上，香港各大院校具優秀學術水平。基金會建議，本港應鼓勵院校進行知識轉移，培育生物科技和商學的複合型人才，讓基礎科研落實到產品成果，推出市場。事實上，本港已有院校躊躇滿志，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已開辦全港首個藥物發現（中藥現代化）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推動中藥現代化。

值得深思的是，要把傳統中藥學經過科學研究，轉化成現代中藥，並非一蹴而就，乃是高投入、高風險、長週期的產業。這有賴中央提供政策，特區政府銳意推動，加上院校、科研機構及業界配合參與，中藥現代化將為人類提供一條健康大道。

團結香港基金執行總編輯

## 香港律師會為大律師公會樹立典範

### 以法論事



江樂士

香港一些專業團體近年來被激進分子滲透，逐漸背離它們原有的使命。這些政治化的專業團體被利用來服膺某些政治目標，最終將難逃衰亡的厄運。

教協就是一個好例子，大律師公會（下稱「公會」）似乎也要步其後塵。公會近年變得像政治組織多於專業團體。在黑暴期間，公會非但沒有守護香港的警隊，反而對暴徒百般縱容。

尤甚者，公會前主席戴啟思在2020年5月25日致函美國大律師公會和其他海外法律機構，表示對香港國安法深感憂慮，

並促請對方留意事態發展云云。國安法頒布實施後，公會仍不收手、繼續其政治搞作。

公會政治化，與專業脫鉤，外界曾期望戴啟思卸任後，公會可以委任一位正直的主席，帶領公會重回專業團體的正軌。然而這個希望最終落空了，公會繼續沉淪。公會在今年1月21日委任夏博義為新任主席，媒體揭露，夏博義不單是英國自由民主黨成員，更是牛津市的市議員，直到1月初才離任。他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從不關注業界利益，而是抹黑國安法，誣毀警方。

夏博義的言論令公會聲譽進一步受損。有關言論讓人覺得他要利用公會主席身份來達成外國政治勢力的目的。

慶幸的是，香港律師會秉持專業精神，沒有像公會那樣走上政治化的不歸路。這全賴律師會主席領導英明、會員盡責。

### 公會政治化與專業脫鉤

律師會在8月24日舉行理事會改選，由「專業派」與自詡「開明派」（實為「港獨派」）爭奪改選後的席位。「專業派」最終勝出選舉，「專業派」在理事會佔據14個席位，「開明派」只佔6席，這個局面將對整個法律界影響深遠。

倘若律師會選擇了政治對抗而非秉持專業精神和理性，它難免步公會後塵，失去社會的信任、被邊緣化、被無視。屆時

政府可能別無他選，只能像對教協一樣宣布終止合作關係。所幸的是，律師會秉持專業精神，保存聲譽。律師會前主席彭韻儀在艱難時刻展現了強而有力的領導力，實在功不可沒。

今年1月，英國外相藍韜文公然威嚇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阻撓他接受香港律政司委任、負責檢控反中亂港頭目非法集結。刑事檢控和法治受到猛烈攻擊，大律師公會竟然一聲不吭、冷眼旁觀。當時只有彭韻儀說句公道話，指出根據國際準則，必須確保律師在不受政府威嚇的情況下履行職責，並且必須尊重檢控的獨立性。彭韻儀各方面都樹立了榜樣，大律師們應向她學習，不要像公會主席那樣沉迷

政治。彭韻儀敢於挺身而出，履行了公會未能履行的道義，希望她的繼任人陳澤銘承傳她的專業精神。

大律師公會已經迷失方向、不能領導法律界，希望陳澤銘像彭韻儀一樣，成為法律界的代言人。

專業機構要在社會上發揮影響力，必須先贏得各界尊重和信任。專業機構如果總是越俎代庖，插手政治，最終只會衰敗、被忽視。香港律師會樹立了典範，希望公會覺醒，自我糾結，專注本分，否則必然被邊緣化，喪失影響力，遭唾棄。

註：英文原文刊於《中國日報香港版》，有刪節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